

教育部项目

《网络舆论引导的实效性研究》（10JYC860013）的结题成果



网络议程设置的 实证研究

蒋忠波◎著

WANGLUO YICHENG
SHEZHI DE
SHIZHENG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基金（10JYC860013）的资助
本书出版得到西华师范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的资助



网络议程设置的 实证研究

蒋忠波 © 著

WANGLUO YICHENG

SHEZHI DE

SHIZHENG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 / 蒋忠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161-5620-9

I. ①网… II. ①蒋… III. ①计算机网络—研究 IV. ①TP3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745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在对传播经典理论的检验中推动传播学的发展	(1)
第一节 当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的问题	(1)
一 系统了解的任务并未完成	(2)
二 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简单移植和套用的情况较为突出	(4)
三 实证研究方法的缺失	(7)
第二节 选择议程设置作为研究对象的缘由	(12)
一 议程设置理论在西方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的显赫地位	(12)
二 国内议程设置研究的局限	(14)
三 议程设置理论对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7)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	(19)
第四节 两个关键概念的界定和使用的研究方法	(20)
一 两个关键概念的界定	(20)
二 研究方法	(22)
第五节 研究的意义与研究创新	(22)
一 研究意义	(22)
二 研究创新	(24)
第二章 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及发展	(25)
第一节 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及形成	(25)
一 议程设置的思想缘起	(25)
二 对 20 世纪 20—60 年代传播效果研究模式的反思	(31)
三 认知心理学的异军突起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冲击	(34)
四 议程设置理论的正式形成	(36)
第二节 传统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	(39)

一	从直接效果论到中介效果论	(39)
二	从“媒介为谁设置议程”到“谁为媒介设置了议程” 的发展	(46)
三	从议题议程设置到属性议程设置的发展	(52)
四	议程设置与框架理论之间的纷争	(59)
第三章 网络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所面临的挑战及议程 设置研究的进展		
		(69)
第一节	网络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所面临的挑战	(69)
一	从辐射式传播到网状式传播	(70)
二	从信息接收渠道的有限性到无限性	(71)
三	网络为受众主动表达信息提供了更丰富的平台	(72)
四	网络人际传播倾向的强化	(72)
第二节	国外关于网络议程设置研究的进展综述	(73)
一	媒体议程与网民议程之间的关系研究	(74)
二	网络环境下的媒体间议程设置研究	(78)
三	博客的议程设置研究	(82)
四	结论及问题	(85)
第三节	国内关于网络议程设置研究的进展综述	(86)
一	思辨类的研究文献	(86)
二	实证类的研究文献	(91)
第四章 网络议题议程设置研究		
		(95)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假设	(95)
一	研究方法	(95)
二	研究假设	(106)
第二节	数据分析及讨论	(108)
一	网络媒体与网民之间的议程设置分析	(108)
二	传统媒体与网民之间的议程设置分析	(111)
三	媒体间的议程设置分析	(114)
四	结论及思考	(121)

第五章 网络属性议程设置研究	(124)
第一节 网络媒体与博客间的属性议程设置研究——以舟曲泥石流事件为例	(125)
一 研究方法	(126)
二 预备分析（议题议程设置效果分析）	(132)
三 网络媒体与博客间的属性议程设置分析	(139)
四 小结及讨论	(155)
第二节 网络媒体与论坛之间的属性议程设置研究——以钱云会事件为例	(156)
一 研究方法	(158)
二 研究假设	(167)
三 预备分析（议题议程设置的效果分析）	(168)
四 网络媒体与论坛之间的属性议程设置分析	(172)
五 结论及思考	(180)
第六章 网络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185)
第一节 研究方法	(185)
一 议程设置敏感度界定	(185)
二 事件的选取	(187)
三 属性议程设置敏感度的测量	(188)
四 影响网络属性议程设置敏感度的变量假设	(193)
第二节 人口学变量与利益关联度变量对网络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	(193)
一 人口学变量对网络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研究	(193)
二 利益关联度变量对议程设置敏感度的影响研究	(201)
第三节 媒介公信力变量与媒介接触变量对网络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	(204)
一 媒介公信力变量对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	(204)
二 媒介接触变量对网络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	(209)
第四节 各变量对网络属性议程设置效果影响的路径模型	(211)
一 模型假设	(212)

二 研究方法	(213)
三 数据分析及讨论	(215)
第七章 网络属性议程设置的属性铺垫效应研究	(228)
第一节 铺垫效应及议程设置铺垫效应的相关研究	(228)
一 铺垫效应	(228)
二 作为议程设置后续效果的铺垫效应	(230)
第二节 网络属性议程设置铺垫效应的研究假设及研究	
方法	(234)
一 研究假设的提出	(234)
二 研究方法	(236)
第三节 数据分析及讨论	(240)
一 网络属性议程设置效果与灾后重建认同度的相关性	
分析	(240)
二 不同媒介报道接触组的受众属性铺垫效应分析	(244)
三 对媒介报道可信度评价不同的组的属性铺垫效应	
分析	(251)
第八章 结语	(263)
第一节 本书的基本结论	(263)
第二节 提升媒体网络议程设置效果的策略	(266)
第三节 对网络舆论研究的启示	(268)
第四节 研究局限及研究展望	(269)
主要参考文献	(270)
后记	(283)

第一章 绪论：在对传播经典理论的检验中推动传播学的发展

第一节 当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的问题

1982年11月23—25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与会的30多名学者经讨论协商后公开发表了传播学研究的16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这16字方针实际上成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纲领。在这16字方针中既蕴含着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目的（自主创新，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原创性的传播思想和传播理论），又隐含着大陆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即先要系统了解西方传播学思想和理论，然后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批判和吸收，最终在借鉴和批判的基础上，联系中国实际创立具有原创性质的中国传播学理论），同时还隐含着对西方传播学的态度（即重视西方传播学的思想及理论，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自主意识，学习西方并不是要照搬西方成为西方传播学的附庸，而是要在借鉴的基础上确立自己在传播学领域中的话语权，以实现与西方传播学的平等对话）。然而，在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陆30余年之后，虽然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其面临的问题却依然严峻。在传播学引进大陆的20年之际（1998年）和30年之际（2008年），传播学界的不少专家都专门撰文对中国传播学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检视。在回顾和检视中既肯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进步，同时也指出了传播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我们在此主要论述我国传播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根据对中国大陆传播学近年来的发展概况，我们将当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系统了解的任务并未完成

在 16 字方针中,“系统了解”被置于第一的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于中国传播学的建设和发展而言,系统了解西方传播学的思想和理论是前提条件。“系统了解”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西方的传播学的了解应该全面。西方传播学虽然创立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较多的流派,既包括美国的主流传播学派,也包括批判学派、媒介技术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等;既包括大众传播学的理论,也包括非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的理论。二是对西方传播学的了解应该深入。深入了解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每一种传播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由于西方的传播理论往往具有鲜明地现实指向性,因此对于传播理论的深度了解必然应该了解理论形成的背景;(2)西方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在提出以后往往得到了后人的不断检验,并在检验中不停地被修正,这些经典理论往往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因此我们应该对其变动有准确把握,这样才能把握理论的最新前沿和洞见其发展的可能趋势;(3)西方传播学理论(尤其是美国主流传播学派的经典理论)的形成与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即研究方法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研究理论的生成,因此我们必须对西方传播学经典理论在形成过程中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度分析,才能发现其理论的有效性范围和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关于我国传播学界对西方传播学的了解概况,不少学者都做了一些重要的回顾和评述。在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陆 20 年之际,徐耀魁先生撰文指出:“我国近 20 年的介绍与研究,始终未能摆脱美国传统学派的影响……未能从他们划定的圈圈走出来。”^①王怡红指出,“近 20 年来,我们的传播研究以 60 年代以前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成果为蓝本,为体系,为对象,而不太注意主流研究之外的传播文化分析与批判研究,或超出美国地域之外的北美、欧洲的传播及新思潮的研

^① 徐耀魁:《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得与失》,《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 年第 4 期。

究，至少我们特别缺乏此类专门论述的著作”。^① 黄旦等人也指出目前传播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之一便是“全面了解不够”，并指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上提出来的‘系统了解’的方针，不仅仍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仍是当务之急”。^② 陶鹤山也认为，“虽然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学者翻译引进了许多国外的传播学著作和理论观点，但从总体上说，中国传播学研究仍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借鉴和消化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③ 孙旭培先生也指出：“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我们对待西方传播学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后两句话今天看来似乎说大了点，但其意思大体还是可以肯定的。可是究其实际，我们到现在连‘系统了解’也还没有能够做到。”^④ 在这些评述中可见，在传播学进入中国大陆的20年余年之际，传播学者所意识到的一个共同问题便是对西方传播学的“系统了解”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在学者们对“系统了解”的分析中，不仅强调全面了解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深度了解的重要性。在这方面，黄旦阐述得非常清楚。黄旦认为人们对于传播理论着重于面上的介绍，而缺乏对理论的具体、深入、系统的评介和勾勒，因此人们对这些理论的内涵及其演变发展的了解并没有增加多少，其结果则是大家都是用所知有限的几个术语，站在同一层次上来回耕作相似的东西，不同的仅是着重点而已，因此国内的研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却“既缺乏立体感也无厚重感”^⑤。

中国传播学界的这一次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1世纪以来的中

① 王怡红：《僵化与断裂——对我国传播研究思路的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② 黄旦、韩国飏：《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年春季号。

③ 陶鹤山：《传播学的危机与重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④ 孙旭培：《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3期。

⑤ 黄旦、韩国飏：《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年春季号。

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近十余年来,传播学界对于西方传播学的译介在面上有了较大拓展,对于欧洲批判学派、媒介技术学派等的译介和研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的相关介绍和研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加强。然而,在对西方传播学的深度了解的程度上却远远不够。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然停留在对西方传播概念和理论的简单理解之上,对于理论的发生和演变缺乏深度了解。对此,陈力丹教授在2004年撰文指出,最近几年的传播学研究存在着“运用现成理论假设的多,对已有理论假设如何得出知之不多”的问题。这是“由于近年来出版的大量传播学译著中,多数为教材,因而造成一种意料之外的后果,即人们接触到的大多是结论,对于如何得出结论反而了解不多,当然也会看轻得出结论的研究过程和环境背景”^①。而王怡红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里也明确指出:“在90年代后,传播研究的主题已经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是,我们的引进与应用还是长时间地停留在被动的知道上,介绍与研究文章还较多地流于表面的一些理论观点,对于该理论的根源和所要解决什么问题还是知之甚少,借鉴与应用的研究基本上也还停留在对既有概念和理论的照搬和套用。”^②

通过以上评述可见,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在引进和消化西方传播思想和理论的进程中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面的拓广上,但是在深度了解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因此,对西方传播理论特别是经典理论进行深度解读,关注理论的起源和形成过程,追踪理论的最新演变是“系统了解”西方传播学的重要任务。

二 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简单移植和套用的情况较为突出

在16字方针中明确提出“自主创新”的观点,这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引进西方传播学的目的在于自主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这意味着研究者不应该将西方的传播理论简单地移植过来解释中国的现

① 陈力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

②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30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

实状况。与这种“自主创新”意识相一致的是，从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陆开始，某些传播学者就具有了“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意识，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才正式提出了“传播学本土化”的呼吁。^①然而自“传播学本土化”提出开始，这一概念就毁誉参半。部分响应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这是建立中国传播学以获取世界传播学界认同的积极方式；而反对者则认为传播学本土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对此刘海龙和胡翼青、孙旭培等对此都有专门论述）。本书无意去辨析“传播学本土化”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只是强调，在剥离了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的色彩之后，“传播学本土化”的提法（姑且不论这种提法是否符合）实际上也代表了大陆传播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试图在了解西方传播学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自己的探索。从这一意义上讲，传播学本土化的提出具有合理性。按照胡翼青的说法，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传播学本土化的路径大致有两条：一是从中华文化中寻找传播思想，然后再用现代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现实有效性的检验（即所谓的余也鲁路径）；二是不排斥西方传播理论，选用西方传播理论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进行检验，在检验中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改、补充或者否定，为建立中国传播学奠定基础（即所谓的张国良路径）。^②在胡翼青看来，以上的两条路径都无法脱离“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因而造成了“路径的迷失”，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作者的批评。但刘海龙先生却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刘海龙先生认为“上述四种本土化的行动路径在当前的语境下均有价值，但从成果来看，这四个部分的发展均不理想……因此当务之急不是争论何种取向是正确的，而是不同主张的学者展开竞争与对话。尤其是加强理论取向的研究，在研究特殊问题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理论”^③。

① 刘海龙：《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两个维度》，《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

② 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③ 刘海龙：《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两个维度》，《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

我更愿意赞同刘海龙先生的看法。因为无论是哪种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路径都反映出了研究者们深入推动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学术自觉（无论是前边所谈到的余也鲁路径还是张国良路径其实都是严谨的研究，都强调要让理论在中国的现实经验中得到检验），而在本土化研究才刚刚起步的情况之下就贸然将其棒杀的做法是不够理智的，也无益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进展。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当下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做一个粗疏的梳理就可以发现，虽然传播研究的文章数量众多，但是相当多的文章都是在简单搬用西方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来解释中国传播现实或为现实提供对策，而根本没有考虑到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有效性范围，更不必谈检验其在中国当下现实社会中的有效性问题了。而无论是哪种传播学本土化路径的研究者，他们都明确地意识到检验理论在中国现实中的有效性问题是发展出普遍性理论的不可缺少的环节^①，而这些却刚好是当下大陆众多传播研究所忽略的。对于这一问题，陈力丹教授有深刻的洞察，他指出当下我国传播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个巨大问题便是在运用西方传播理论的时候“直接将各种理论假设运用到各种研究中去的情形较为普遍，而忽略了不同的环境背景”。^②而王怡红对30年来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中进一步指出目前传播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运用传播理论对丰富的传播现象进行多视角的分析论证时，受到研究者关注较多的还是，研究中是否应用了某种理论，而忽视该理论在解题过程中，是否具有从本土研究中生长出来的，具有本土经验和应用的有效性等问题。若是不关注理论运用的有效性，这无疑等于自动放弃了对现有理论假设

① 在胡翼青所归纳的两中路径中，都强调对理论有效性的现实检验。余也鲁路径强调从中华文化遗产中寻找一些传播的通则并据此提出假设，检验这种假设在中国当下社会的有效性，如果有效则可能建立通用的理论；张国良路径则主要检验西方传播理论中的假设在中国当下现实中的有效性问题。而刘海龙对持传播本土化研究的两种方案的分析也同样体现出他们强调对理论的现实有效性的检验。参见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及刘海龙《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两个维度》（分别刊载于《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

② 陈力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特点与问题》，《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

的科学检验。然而，理论若是缺少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经验的检验，新的理论就无法产生，中国传播学者对传播研究的贡献也就无从提起。由此推论，缺少了对理论检验的重要环节，理论的创新就很容易成为一句空话。”^①

由此可见，要改变当下机械套用西方传播理论于中国当下现实的研究状况，就必须首先强化对这些理论假设在中国当下现实土壤中的有效性检验，在检验中来证实、修改、补充或者是证伪这些理论假设，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建构起既有本土特色又具有普遍性的传播理论。即使在这些检验之中，原有的西方传播理论被证明完全符合中国当下现实，那这一过程也没有白费，因为通过这种检验之后我们就可以有充分的信心将其用于解释和预测当下中国的传播实践。

三 实证研究方法的缺失

如前文所述，我们对西方传播理论还缺乏深度了解，而要深度了解这些理论，就必须对建立理论所依赖的方法做深入了解。正如崔保国教授指出的那样，“对于诸多传播学理论，我们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就要深究每种理论得出结论的研究方法是什么”。^②同时在中国当下现实中对理论假设（无论是来自中国文化中的理论假设，还是来自于西方的传播理论假设）进行有效性检验是推动中国传播学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环节，而在这种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的过程中恰当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

从总体上看，传播研究方法可以分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类型。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合适的研究对象，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但是二者间的区别也绝非泾渭分明。一般而言，思辨研究更加适合于对传播价值、意义、本质等问题做理性思考，其结论很难被证明或证伪；而实证研究更加适合对可以观察到的传播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和

^①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30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

^② 见崔保国教授为英国学者安德斯·汉森所著《大众传播研究方法》（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所写的《译者序》，第2页。

预测，其结论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并可以被证伪。当然，思辨研究也可以运用经验材料，而实证研究也不缺乏理性的思考，但是二者的区别在于思辨研究是“操作概念”，即概念并不是从经验事实中得出来的，因此使用经验材料是为了佐证其概念；而实证研究是“确认事实”，即是对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现象中所可能蕴含着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旦被证明，便可以被称为理论）。^① 作为两种研究范式，二者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两种范式对观察和认识社会现象、形成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②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思辨研究具有更悠久的传统，而作为一种研究规范的实证研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得以逐渐确立的，因此实证研究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传统的依靠权威、宗教信仰、习俗以及人的内在心灵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而言，其科学性无疑更加明显。

在实证研究中，又有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间的区分。所谓定量研究，是指“定量研究中的分析单位是‘量’。通过观察和测量，研究者使用数量、频率、程度、值以及强度等工具，来描述传播现象。把传播现象量化后，研究者再通过统计学方法将以上各种结果互相比较”的研究方法，可以包括问卷调查、实验研究等；^③ 而定性研究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其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研究者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及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研究过程是

① 关于思辨研究是“操作概念”而实证研究是“确认事实”的观点，详见卜卫在《传播思辨研究论》（《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5期）一文中的相关论述。

② 卜卫：《传播学方法论引言》，《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4期。

③ [美] 琼恩·基顿：《传播研究方法》，邓建国、张国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研究结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详细加以记载和报道”。^① 由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个概念的界定中可见，二者都强调系统地收集资料以及对资料进行详细的分析，并通过这种分析来检验已有理论或者发现新的理论，因此真正的定量研究并不缺乏理论的深度，而定性研究在对事物进行深度体验和解释时也常常使用量化的数据，建构理论往往是二者的共同追求。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内传播学界不少人对定量和定性研究的理解是不够准确的。^②

在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陆学界的初期，学界所引进的对象基本上是美国主流传播学派的相关理论，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中研究者们也多是在使用美国主流传播学派的概念和理论，但是却少有研究者使用其实证研究方法来进行相关研究。^③ 这一问题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成为传播学界所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潘忠党教授指出我国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是“重规范型理论的探讨，而缺乏实证型的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核心任务应当是对所研究的现象做出描述和解释，以给人提供对这些现象的理解。要做到这一点，对于关注文化及其变迁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者来说，必须重实证研究，重理论（实证理论）的构筑。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④ 黄旦教授也指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相当的不如人

① 陈向明：《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6 期。

② 国内传播学界不少人指责“定量研究”因缺乏理论的深度而肤浅，同时又过度宽泛地理解了“定性研究”的含义，将一切非定量的研究都视为“定性研究”，把哲学思辨、个人的片段思考、感想、个人经验或印象的描述、对政策简单诠释等都纳入“定性研究”的范畴。这都是对“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误读。实际上，定量研究同样追求理论的建构；而定性研究则强调系统长期收集资料、体验式的研究过程、当事人的视角和对研究结果的检验等。对此的详细分析可参见卜卫在《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国际新闻界》1997 年第 5 期）、陈向明在《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6 期）中的相关论述。

③ 当然，在 80 年代以后，大陆有少量学者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实证调查研究。比如当时复旦大学的祝建华、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崇山都进行了对中国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调查研究。

④ 潘忠党：《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下），《现代传播》1996 年第 5 期。

意。他指出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的定性部分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哲学思辨的高度，它们“与批判学派相似的只是我们惯于切入的某些角度。我们的应用研究既没有批判学派的思变能力和理性色彩（因不具备这样的理论功底），又不谙美国学派实用调查技能和方法，事实上是在用美国的理论做定性文章，这类研究指苍白无力，难以产生影响，主要原因怕就在于此”。^{①②} 对于定量研究，黄旦教授做了这样的评价：“至于定量研究部分，其本身能够出现、存在并有所发展，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因是全新的东西，参与的人力不多，研究的力度和系统化均不够，总觉小打小闹，零碎随意。更令人不安的是，定量研究本应补理论之不足，或是修订，或是证实，或是发现一种新的理论增长点。我们的研究却缺少这样的理论发现和启示，似乎是在操演方法，为作而作。”^③ 胡正荣教授认为我国的传播学理论较少有深厚现实基础的实证研究，对我国传播业的实际关注较少，从而形成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及理论体系的建立缺乏基本的介质，因此，“我国的传播学研究需要从实证研究中建立一整套理论范式”。他明确提出我国传播研究的研究方法定位应该是“我国传统的人文学术的定性分析需要保持，但是科学研究的量化方法，即定量研究（实证分析）更需加强……要使传播学真正成为一门客观的证实或证伪的科学，而不是主观色彩浓郁的人文描述”。^④ 以上学者在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陆20年之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回顾和批判中可以看到，实证研究方法的缺失，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定量研究方法的缺失是制约我国传播研究发展的一大因素，因此他们提出的解决策略便是强化实证研究

① 黄旦、韩国飏：《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年春季号。

②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本书对定性研究的界定，黄旦教授在论文里所指的“定性研究”更倾向于是一种思辨研究，但是由于普遍没有达到思辨的深刻性而成为一种个人感受的书写和政策的简单应对的阐释。按照社会科学中定性研究的严格界定，在当今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中，定性研究的数量微乎其微，甚至在数量上要远远少于定量研究。

③ 黄旦、韩国飏：《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年春季号。

④ 胡正荣：《我国传播学研究与传播业的互动（论纲）》，《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